

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

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編

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號

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1/8 字數 27,000

一九五七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南京第六次印刷

印數 235,001—265,000

統一書號： 3100·116

定 價：(4) 八 分

(內 部 發 行)

目 录

党不能发号施令嗎？	2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	6
反右派斗争的一次偉大胜利	18
在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20
用人可以不問政治嗎？	28
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黨員的重大考驗	33

目 录

党不能发号施令嗎？	2
我們同資产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	6
反右派斗争的一次偉大胜利	18
在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	20
用人可以不問政治嗎？	28
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驗	33

党不能发号施令嗎？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論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一般地并不直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共产党的领导。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时候，他們又說，他們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只是反对所謂“党天下”的思想，只是反对共产党組織在各个国家机构中起领导作用，以及反对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我們在这里想專門談談所謂党对人民发号施令的問題，其他的問題將另行討論。

黃紹竑在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談会上談到党政关系問題的时候，曾經批評党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或者党和政府联合发布指示，認為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龙云、譚惕吾、楊玉清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也有类似的說法

真的是如此嗎？党的发号施令居然有这样大的罪惡嗎？

不要誤会了黃紹竑。他也是十分“拥护”党的领导的。据本报5月17日的記載，他在提出上述意見的时候先說了这样一番話：“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也必須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疑問馬上就来了：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共产党领导革命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领导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固然离不了向人民发号施令；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共产党为了领导历次群众运动，贯彻执行各项政策和重大的法令，仍然免不了向人民发号施令，或者同政府联名发号施令。据说这个领导方法“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然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却在这个领导方法下得到了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得到了巨大的进展。这怎么能够“毫无疑问”呢？

究竟所谓党向人民发号施令的问题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发布一种强制性的命令，那么，这不是党的任务。党是群众的思想政治的领导核心，而不是有必要对群众实行某种强制的国家机关。党不但在自己的群众工作中经常防止和坚决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求自己所领导的政府机关也防止和反对命令主义。这就是说，政府虽然常常需要向人民发布强制性的命令，但是也不应该以为仅仅依靠命令，而不依靠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就可以完成任务。

第二，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发布一种关于日常行政事务的指示，那么，这也不是党的任务。党是我国政府的领导力量，它领导制定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并且力求保证它们的正确实施，但是它不能代替也不应该代替政府机关的行政活动。党反对包办代替任何非党机构的活动，反对离开自己的政治任务而陷入日常琐事的事务主义倾向。

第三，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向人民发布政治任务的号召，发布关于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的指示，那么，无论是由党单独发布，或者是由党同政府联名发布，都是必要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在党还存在的时候）还是这样。

共产党是劳动人民中最觉悟的部分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共产党由于它的主张的正确，由于它在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最前线，在全国人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解放区，

广大的人民群众固然十分重视党的号召和指示；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先进的群众也十分重视党的号召和指示。正是由于党对于人民群众坚持正确的领导，及时地向人民群众发布各种号召和指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行动，这才使人民革命得到了胜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呢？发生的变化，就是党的领导地位更巩固了，党的领导作用已经普及和深入到全国的各个地区，同全国六亿人口结成了广泛的血肉的联系。而这也就是我们的国家可以实现空前未有的团结和统一，我们的国家的各方面工作可以获得空前未有的迅速发展的基本保证。全国的各方面的行政工作，当然需要由政府机关去执行。但是不但在中央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需要由党来领导制定（在领导制定的过程中，党首先依靠对于广大群众的经验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同党外人士的协商），而且在地方和基层，这些方针政策仍然需要由党来保证它们的正确的、适合具体情况的贯彻执行，仍然需要由党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思想工作，使这些方针政策变成群众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因此，周总理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党对于人民群众直接发出政治上的号召和政策性的决定，对于政府工作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很大的帮助。”共产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不但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是任何其他党派和其他政治组织所不能代替的。试问，有什么理由来改变和削弱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呢？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民直接听到党的声音呢？难道把党的声音对人民秘密起来，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就可以大大加强，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可以大大减少了吗？

真是出奇的好主意！这种好主意的实质是什么？

这种好主意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党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削弱党对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是要使得我们的政府机关变为真正的

官僚机关，使得党变为政府机关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不对人民“发号施令”（在我们所已经解释过的意义上）的执政党是有的。那样的党是因为彻底地脱离人民，所以它不可能向人民发出任何有威信的和指示。那样的党所“领导”的政府，除了向人民实行强制以外，不知道别的也不能有别的工作方法。大家记得，国民党就是那样的党，国民党政府就是那样的政府。

的确，黄绍竑之流对于那样的党、那样的政府是很有经验的。他们曾经在那样的党和政府里久居高位，他们通过那样的党和政府的机构干了些什么事，人们记忆犹新。因此，对于他们的“批评”，人们也不难作出正确的估价。

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得还不久。因此，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个制度还有许多不了解，对于党在这个制度中的作用还有许多不了解。同时，也由于这个制度建立得还不久，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党和政府之间的工作关系，也还有许多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提出的一切善意的批评，应该加以欢迎；一切正确的建议，应该加以接受；提出的疑问，也应该进行解释。但是为了捍卫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党的领导地位，对于恶意的挑拨者和诽谤者，人民的任务却是给以坚决的、毫不含糊的回击！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

中共中央宣傳部長 陸定一

我完全同意周恩來總理、李先念、薄一波副總理、董必武院長、張鼎丞檢察長、彭真副委員長、烏蘭夫副總理和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報告。

我國歷史上偉大轉變的一年

過去的一年，在我國歷史上是偉大轉變的一年。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在我國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個革命是用和平的方法實現的。我國經過了這樣一個深刻的革命，却在經濟上和社会秩序方面沒有發生波動，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功。原來預期要十幾年才能完成的社會主義革命，七年就基本完成了。這對於人民政權的鞏固，對於我國經濟和文化建設的今後發展，都是極其有利的。

過去的一年，我國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有了空前的發展。就工農業生產的總產值來說，第一個五年計劃實際上已經四年完成。這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的大勝利。

過去的一年，我國戰勝了數十年來未有的大災荒。這種大災荒，在舊社會里會引起大量的死亡，會使災區農業生產多年不能恢復正常狀態。我們卻避免了這種情況的發生。

以上這些，我們都做到了，但是我們還不滿足。我們清醒地看到，雖然有了這樣大的成績，但是工作中還有錯誤和缺點，還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必須消除這些錯誤和缺點，以便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動員國內國外一切積極因素，使社會主義建設得到更為順利的進展。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从去年起已经陆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把这些政策作了系统的说明。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透彻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今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整风运动。

以上所说的经过情形，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要再说一遍，因为有些右派分子在胡说八道。他们说，共产党到处是错误，天下是漆黑一团。他们说，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非整风不可，而且非下台不可。

共产党的此次整风运动，是在取得了大胜利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毛主席在他的报告里提出的各项政策，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政策在内，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条件之下提出来的。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取得胜利，就不可能系统地明确地提出这些政策。正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取得革命胜利的斗争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般地是接受或赞成社会主义革命，再加上其他因素，所以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了这些政策。同时，今年又决定在党内进行整风运动。

右派分子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他们被完全孤立起来了

可以看到，人们对整风运动和对党的政策，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绝大多数的人，是站在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了解整风运动和党的政策的。他们真心善意地帮助共产党，要加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要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只有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以为鸿鹄将至，天要变了，可以向社会主义、向人民民主制度、向共产党大举进攻了。

趁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资产阶级右派混在真心善意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人群之中，趁火打劫，混水摸鱼，进行他们蓄谋已久的政治活动。他们积极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他们企图首先夺取民主党派、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科学技术界、工商界、司法界的领导权，然后进一步夺取全国的领导权。他们企图鼓动学生闹风潮，并且作出估计，说学生问题一触即发。他们以为，学生一上街，右派分子一到基层去点火，工人职员就会跟着学生闹事，右派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和六教授谈话时做出的估计。值得注意的是，这六教授中，有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在内，他就是向章伯钧献计，说什么学生问题一触即发的。一个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长，唯恐学校不乱，究竟居心何在？我们不能不问。

现在，事情已经明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工农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知识分子的觉悟程度，过低地估计了工商界的觉悟程度，也过低地估计了各民主党派中多数干部和成员的觉悟程度。右派首先在工人那里碰了壁，工人把到工厂里去活动的右派分子赶了出来。右派在农民和城市居民那里也碰了壁，他们反对右派的反动行为。右派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但他们在高等学校里充其量只得到大约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的支持和盲从，随后盲从的人也纷纷觉悟过来，现在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个人了。右派把希望寄托在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上，他们提出了什么“保护科学家”，什么“教授治校”之类的蛊惑性的口号，施用了吹、拍、骗的手段，但是他们仅仅能够得到百分之几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和盲从，现在，这些人的大部分也正在离开他们。右派在工商界中仅仅得到寥寥落落的几声响应，却出乎他们意料地遭到大多数工商界人士的反对。右派在民主党派中也是很不如意的，现在许多民主党派决定要整风，并且已经起来反对右派分子。这个时期，全国人民上了一堂政治课，大大地提高了政治觉悟，而右派则被完全孤立起来了。

要不要社会主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起来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不许右派翻案，不许右派倒算。

右派煽惑说：肃反运动“糟糕透顶”，思想改造运动完全错了。

现在看得很明白，幸亏我们做了肃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否则，这次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恐吓信和炸弹案是会多得多的，社会秩序是会乱一些的。文艺界如果没有进行过反对反革命分子胡风的斗争，这次就会更乱一些。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所以只有很少人附和右派，不能不说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成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肃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不是孤立的东西，而是周总理所说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的组成部分。我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可以有三条道路。一条是，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一条是，以强力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一条是，反革命依靠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力量，实现复辟。这三条道路之中，那一条道路对工人阶级、对全国人民最为有利呢？当然是和平革命最为有利。我们在宪法总纲中，已经把和平革命这条道路确定下来。为要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不进行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可以不可以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不进行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就不能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等待反革命来进行复辟。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且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右派则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对已经基本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来一个倒算，来一个翻案。我们全国人民同右派之间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

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該起來保衛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不許右派翻案，不許右派倒算。

要不要工人階級領導？

中國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才能成功，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的革命。反共，這就是賣國，就是亡國，就是民族的大災難。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第二個根本分歧，是對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看法問題，是對工人階級政党和資產階級政党的看法問題，也就是中國革命應該由那個階級來領導的問題。

右派認為，資產階級比起工人階級來，資本家比起工人來，決不是更差一些，而且還似乎是更好一些。斯大林說“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意思是勉勵共產黨員，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有什麼不好呢？右派分子章乃器反對斯大林的這個說法。章乃器的意思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並不比資本主義思想高明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工人階級的思想並不比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思想高明些。既然如此，那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就是錯誤的。憲法第一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右派說：工人階級領導就是“溝”和“牆”的來源。因此，工人階級的政党共產黨不應當領導國家，如果領導國家，那就是“黨天下”。因此，就應當反對“黨天下”，實行“輪流執政”，實行“兩黨制”，搞“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等等。

憲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等都是人大代表，都投過票贊成憲法。可是他們背信棄義，要來反對憲法第一條。這難道不是根本分歧么？

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憲法里確定，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

級領導的國家，而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這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根據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革命經驗規定下來的。一百多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我國只有兩條路，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或者是新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中間的道路——資本主義的中國，是不可能的。中國的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才能成功，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的革命。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尚且不能實現，何況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還能設想么？

翻開我國的歷史，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戊戌政變、義和團、辛亥革命，都遭到了失敗。直到十月革命後，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我國的先進人物才覺悟到，中國的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才能勝利，因而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後，中國革命展開了嶄新的一頁。聯共與反共成為革命與反革命的分界線。所有的反動派沒有不反共的，所有的革命派沒有不聯共的。孫中山先生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革命事業就興旺起來。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反共剿共，革命事業就倏斷送，日本帝國主義就致于來并吞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我國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們就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抗戰以後，蔣介石再次進行反共的內戰，我國幾乎變成美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幸而人民的力量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已經壯大，所以我們能夠推翻美國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統治，把我國從危急存亡的險境里挽救出來。中國人民在三翻四覆的經驗中，已經懂得：反共，這就是喪國，就是亡國，就是民族的大災難。中國人民把自己的長期的經驗總結為一句話，叫做“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並且把工人階級的領導寫到憲法里面去。右派的所謂反對“黨天下”，不是別的，就是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等反革命論調的翻版。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等，在開始叛變民主革命的時候，都說他們自己是革命的，決不會做反革命，他們僅僅反對共產黨而已。資產階級右派說，他們自己是擁護社會主義的，

是好心好意的，他們仅仅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已。兩者之間，手法完全相同。

要不要人民民主專政和民主集中制？

社会主义国家必須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实行專政；人类社会永远需要民主集中。右派的所謂“絕對民主”，无非是想迷惑群众，造成天下大乱，进行反革命复辟。

我們同右派的根本分歧，也在对資產階級民主和无產階級民主的看法的問題上表現出来。

究竟是無產階級民主制更加民主些？还是資產階級民主制更加民主些呢？我們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是“狹窄的，殘缺的，虛偽的，假仁假義的，对于富人是天堂、对于穷人和被剝削者是陷阱是騙局的民主制”；無產階級民主制，是“为絕大多數民众，为被剝削的劳动者所享受，并发展到空前未有的地步的民主制。”（以上引語都見列寧著“無產階級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書）右派与此相反，他們要求什么“絕對民主”，他們說，資產階級民主制就是这种“絕對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制比無產階級民主制还要民主。

我国資產階級只有几百万人，資產階級民主充其量只是几百万人的民主。劳动人民有几万万人，無產階級民主就是几万万人的民主。只看看这一点，就知道無產階級民主制比起資產階級民主制来，要更为民主得几百倍。历史上，我国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几次国会选举，包括蔣介石的国民大会的选举在內，都是賄賂公行。資產階級民主制在我国老早已經破产，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地方。現在，我国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下，不仅劳动者有公民权，民族資產階級分子也享有公民权。世界上沒有一个資本主义国家能有象我們这样的广泛的民主。

無產階級民主制，是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最民主的一种。它只

对极少数的人实行專政。资产阶级民主制，却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專政。比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还要民主的制度，那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会有，因为那时就不需要專政了。可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專政的对象沒有了，政权也就不存在了。那时候还有民主問題，但已經不是“民主与專政”这个范畴里的民主，而只有“民主与集中”这个范畴里的民主了。主張“絕對民主”的先生們，你們的所謂“絕對民主”，是意味着不要專政么？一切政权都是階級对階級的專政，社会主义国家必須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实行專政，否則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存在。你們的意思是不要集中么？人类社会永远需要集中。沒有集中，就犹如沒有民主一样，人类社会的存在不能設想。所謂“絕對民主”，只是反动的幻想，現在不会有，將來永远也不会有。

依照右派的主張行事，既不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專政，又不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我們的国家就毫无疑问一定灭亡。

右派的目的，是用所謂“絕對民主”的口号，来迷惑群众，造成天下大乱的局势，以便反动分子可以乘机大肆活动，进行反革命的复辟，建立反革命的專政。

要不要联合苏联？

中苏团结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是整个人类的最大利益所在。联合苏联还是反对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我們同右派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态度。

宪法序言說：“我国同偉大的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經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这种友誼將繼續发展和巩固”。

应该发展和巩固中苏友誼呢？还是應該削弱和破坏中苏友誼

呢？宪法明明写着“繼續发展和巩固。”

联合苏联，这不但是共产党的主張，孙中山先生也老早提出了这样的主張。孙先生的致苏联遺書，現在我們讀起来还非常感动。联合苏联还是反对苏联，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中苏团结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是整个人类的最大利益所在。沒有中苏兩国的巩固团结，世界和平就沒有可靠的保証，人类就可能受到极大的灾难。所以我們主張无微不至地爱护这个团结。

右派同我們不一样，他們用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来煽动群众，要挑起中苏之間的不和。他們的言論，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和蔣介石的論調的翻版，就是要把苏联說成是“赤色帝国主义”，而不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

資产階級民族主义有三种。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这是革命的，我們贊助这种革命的民族主义。有中立主义的民族主义，这种中立主义，在資本主义世界里出現，它的主要作用也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是我們所同情的；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出現，就有不同的作用，是我們所不同情的。有反苏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些是反动的民族主义，我們必須坚决反对。右派的反苏活动，在我国是違反宪法的，是不容許的。

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

綜合以上所說，可以看見，我們同右派的斗争，是兩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工人階級領導，不要人民民主專政和民主集中制，不要联合苏联，那就只能亡国。右派的主張，就是要我們亡国，就是要我們人头落地。

我們同資产階級右派在这些根本問題上进行斗争，已經有多